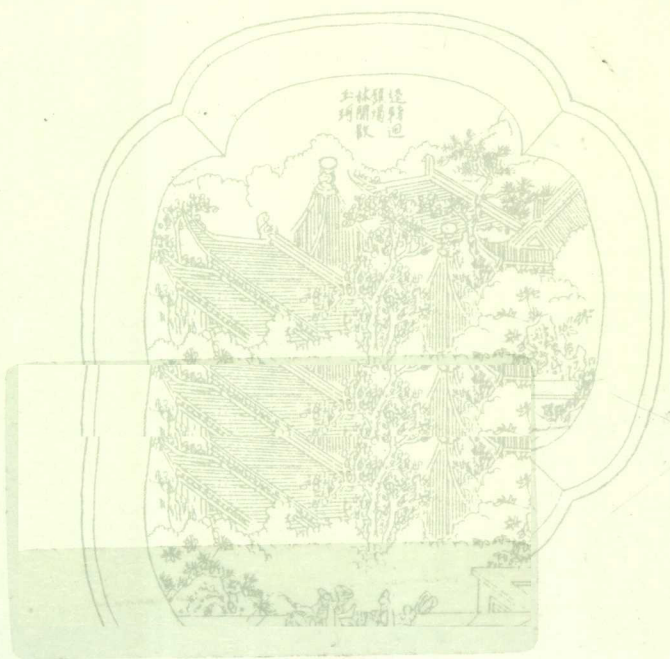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

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

〔日〕近藤一成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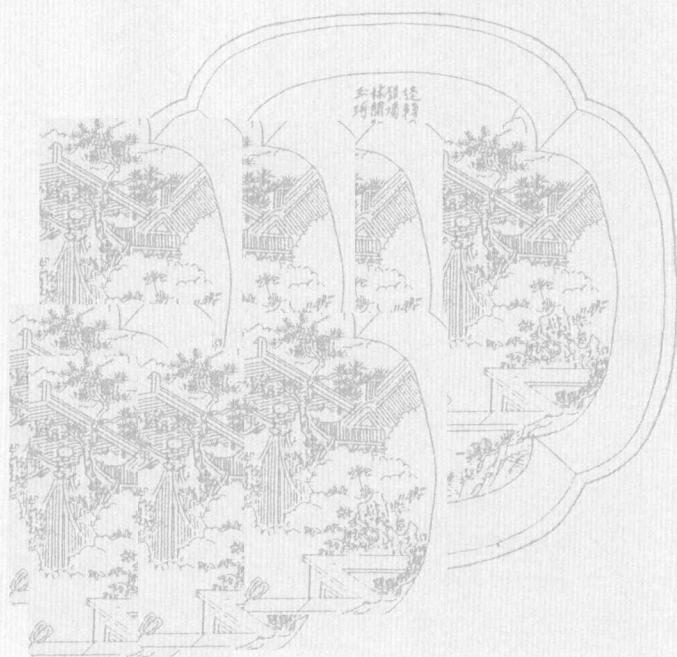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

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

〔日〕近藤一成 主编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 / (日)近藤一成主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5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

ISBN 978 - 7 - 101 - 06300 - 4

I. 宋… II. 近… III. ①中国—古代史—宋代—文集②中国—古代史—元代—文集 IV. K244.07-53
K24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08)第 135371 号

-
- | | |
|-------|---|
| 书 名 | 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 |
| 主 编 | 〔日〕近藤一成 |
| 丛 书 名 |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 |
| 责任编辑 | 李 静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
| 版 次 |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½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
| 印 数 | 1-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6300 - 4 |
| 定 价 | 39.00 元 |
-

总 序

佐竹靖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契机下，全球一体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电子网络的发展，将世界各地瞬间连接在了一起。这样，历史研究也可以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来进行了。

与此同时，人类还共同面对着资源、环境、人口等诸多重大课题。这些问题提示我们，当今人类的存在本身就受到了极大的局限，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还包含因可怕的核战争而导致人类灭亡的可能性，事实上是由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

可以说，这些事实昭示了人类正面临某种意义上的落幕。这是否会变成如文字所说的落幕即人类的结束？还是人类跨越这一考验，站在更高的层次迈出下一个历史的第一步呢？这些问题令人难以预测。

面对这种考验，我们能够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重新探索人类走过的道路即人类的历史。

我们作为过去人类存在的结果而生存于今天，如果能够认识过去的我们的

存在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或许对我们的未来能够投下一缕哪怕是朦胧微弱的光亮。而且,构成中国历史的人数如此众多,展开的场面如此宏大,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自然成为极其重要的研究对象。以此为目的,构建一个汇集我们力量的最基础的平台,这便是我们在日本出版《中国史学の基本問題》(《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的初衷。

问题摆在全人类的面前,我们作为全人类中的一员也不得不接受这些问题。出于这种观念,本书将各论文作者通过各自的兴趣和思考而提出的、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基本问题和思考的问题作为本书的课题,这些问题不应只限于专业课题,还应当使我们的后辈及学生们能够理解。通俗易懂地提出来的问题,我们的后辈及学生们才有可能理解。他们对这些问题持有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以及通过以此为基础的实践,或许能对当今人类的前进步伐和课题产生一些影响。换言之,本书的直接目的有两个,一是系统地认识各位作者作为专家所理解的重要问题的意义,其次是使其成为能够引发年轻研究者兴趣的入门性读物。

以此为目的所编纂的《中国史学の基本問題》(《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于1996年出版了第一卷《宋元卷》,翌年的1997年出版了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和第三卷《明清卷》,最后于2001年出版了第四卷《殷周秦汉卷》。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丛书在日本出版后不久,我们便着手为出版该书的汉译本而努力,其中的《明清卷》以该卷主编森正夫为主,决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的三卷于2004年与中华书局商定了出版协议。

这样,在该书的出版和此次的汉译,时光流逝,世人目睹了中国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更有了大量的新资料的发现和公开。从这两点来看,可以说本丛书已经稍有些落伍。对于此次汉译本在中国出版,有的学者为此有些顾虑,也有意见认为不做什么修改便发表是不负责任。另外,这套丛书原本是以日本国内的学生及年轻研究者对象而编纂的,完全没有预想以中国本土的研究者作为读者,因此,有的学者对在中国本土出版这种所谓的“内部刊物”抱有消极的看法。

尽管本书的作者们提出的这些看法确有道理,但我们最终还是下决心出版

这套丛书的汉译本。坦率地说,这是因为我们热切希望自己的研究为中国的学者们所理解,或许理解之下会有严厉的反对和批评,我们期待得到各种指教。

虽然日本社会在东亚世界中受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但却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当东亚世界受到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直接影响时,两国的关系进一步产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这些置身于两国历史关联中的日本研究者,正是希望认识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并以此帮助认识日本历史的真实面貌而进行的这项研究,希望中国本土的研究者对在这种历史条件以及我们对此做出的回应和努力下形成的日本的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予以理解,并使我们获得诸多的批评意见,这是我们日本研究者的极为坦诚的愿望。

为此,我们下决心在中国翻译出版这套留有若干缺陷的丛书。为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和新资料的大量发现和公开,我们也曾讨论过对丛书加以修订,但最终的结论是我们难以完成如此的工作,所以,本书基本上是按日文本原样翻译成汉语出版的。这样一来,给尤其是因考古学资料的剧增而大受影响的《殷周秦汉卷》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国读者对本丛书以下两点局限予以谅解,一是本丛书在某种意义上有些落伍,二是该丛书原本的设想是以日本国内的青年研究者为主要读者的“入门书”。

同时,我们在本丛书的日文本中汇集了对中国史学之“基本问题”的认识,期待能取得超越某些局限的成果。不论什么时代,基本问题都不会轻易地改变,而且基本问题在初学者和专家之间是共同的。我们由衷地期望这种愚拙的尝试能够得到中国学者们的批评指正,成为确定更具普遍性的“基本问题”的第一步。

最后,想就本丛书日文本的编辑和汉译本编辑之间的若干差异做一点说明。

本丛书日文本的编辑工作是按以下基本方针进行的,即各卷的编委们以其责任编辑为主进行编辑工作,即第一卷责任编辑为松丸道雄、古贺登,第二卷为谷川道雄,第三卷为佐竹靖彦,佐竹同时兼任第一、二、四卷的编委,负责全书的

协调工作。

与日文本不同,汉译本采取的形式是各卷只设置责任编辑,佐竹靖彦作为主编,统筹全书的工作。方针的改变是因为作为已完成的日文本的中文翻译,工作量明显减少,同时与中国方面联系协调时需要更有效的对应。因此,此次各卷的责任编辑为第一卷佐竹靖彦,第二卷谷川道雄,第三卷近藤一成,第四卷如前面所述,以森正夫为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一卷的责任编辑由松丸道雄、古贺登两位改为佐竹,原因是该卷由于有新出土资料的大量增加,该卷的编辑和作者对不经过相应的修改就出版该丛书抱有非常谨慎的态度,认为带着那样的缺陷出版,作为研究者难以积极去运作。对此,身为全书主编的佐竹充分理解这些问题,但鉴于出版计划的全盘考虑,希望仍按原样出版。应此请求,第一卷的编委们考虑如果由佐竹来担任责任编辑,也可以出版,就此该丛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所以,本丛书的编辑责任和功绩基本归于日文本的编者,中文翻译的编辑责任和功绩归于汉译本的编者。以下再次注明日文本和汉译本的编者姓名,以供参考。

日文本

第一卷责任编辑松丸道雄、古贺登。编委永田英正、尾形勇、佐竹靖彦。

第二卷责任编辑谷川道雄。编委堀敏一、池田温、菊池英夫、佐竹靖彦。

第三卷责任编辑佐竹靖彦。编委斯波义信、梅原郁、植松正、近藤一成。

汉译本

总编佐竹靖彦,第一卷主编佐竹靖彦,第二卷主编谷川道雄,第三卷主编近藤一成。

(吕静 译)

目 录

总 论 /1

围绕两宋王朝的国际关系

——时代的俯瞰图 /33

“权监察御史里行”李定

——关于王安石的御史台政策 /51

宋元军制史上的探马赤(tammachi)问题 /73

南宋时期“社会中间阶层”的出现 /100

宋代的价格和市场 /117

关于10—14世纪中国社会与自然的人类史考察

——白菜、油菜、柑橘栽培和意识性、自然性 /142

元朝统治下的江南地域社会 /168

近世地方政治的诸多现象 /188

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

——黄榦的礼世界和判词世界 /215

社会与思想

——宋元思想研究笔记 /246

关于宋代佛教社会史 /265

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及课题 /282

总 论

佐竹靖彦

序 言

本书的宗旨,是由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提出并确定宋元时期各个领域的基本问题。

这里提到的基本问题,其“基本”一词的含义,与中国史研究中曾深深占据人们思想的含义无疑是大相径庭的,当时人们认为存在着世界史的基本法则,它的解释和应用就是历史学的根本问题。

曾在一个时期,世界史之基本法则的存在及其认知被视为历史学的根本课题,尤其在先验性价值观和法则性的关系上显示出它的观念性特征时,便会有另外一种学风悄然取而代之,进而广为流行。这种潮流看上去既是一种对个别的、具体的历史现象的潜心研究,又是一种对个别的、具体的历史史料的探讨和以此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

的确,对个别的或具体的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要

求。只要我们自身的存在首先是个别的或具体的,那么引发我们兴趣的对象也就是个别的或具体的,这应当说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对个别的或具体的历史现象的研究,与同样为个别的或具体的历史史料的研究实证性地结合在一起,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目前,我们摆脱了曾经流行一时的大理论和大法则的束缚,开始慎重地探索个别的具体的世界,这或许是历史学获得新生的重要基础。

但是,究竟是否可以说对个别的具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史料的深入研究,以及由此得出的实证就是历史学的全部呢?历史现象本身并不仅仅停留在个别的存在上,而是存在于与其他历史现象难以分割、相互牵连的关系之中。只要这种综合性历史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而我们自身的存在又是具有该意义的过去历史的结果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站在与过去急躁地强调价值观相反的立场上,以个别性具体性为基础,来关注不受其局限的历史的整体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将再次从综合性立场出发,去探讨什么是历史学的基本问题。

在各个研究领域中,究竟以什么为基本课题?首先应该是由每个研究者以自己的判断来做决定的、极其主观性的事情。但是,它又不单纯是主观性的问题,而是每个研究者在尽可能客观的意识下提出来的主观性判断。本丛书的论文便是采取这种形式,由研究者提出各个时代各个领域的基本问题,并对此进行分析。至于每个研究者在此提出的基本问题具有多大程度的客观性,也许首先是来自读者直觉的定位,其次是与读者相互的理论性探讨中来决定它的位置。

作为本卷总论的执笔者,本人的立场是将范围限定在宋元史方面,具体地说,情况大致如下。

我们的历史,明确地分为资本主义体制确立之前和之后两个部分。资本主义体制的确立,根据它是否基本上靠自己独立完成,被分为两种类型。最具常识性的看法是西欧属于前者类型,日本和韩国属于后者类型。其次是,当资本主义体制将世界融入到再生产结构中时,成为对象的世界虽然历经艰难曲折,最终被分为基本能够维护社会自身的自律性或自我同一性的社会和不能维护的社会。如果按这个标准的话,日本和韩国显然是属于能够维护自律性和自我

同一性的社会,中国、印度及中近东的社会大概也属于这个类型。从宏观上来看,可以说这些社会与正在形成资本主义体制的西欧社会有着长期的、基本对等的并存关系。这样,说得极端一些,可以这么认为,这两种事态得以保障的原因,是由于这些社会已经自律地确立了广域性的社会关系。本稿将把这种社会状况看作是世界史意义上的近世阶段。

站在上述立场上,笔者想继承由内藤湖南开始、由宫崎市定全面确立的体系,也就是将宋元时代作为世界史意义上的近世社会的学说体系。

关于具体的章节,第一章站在将宋元时代看作世界史意义上的近世社会这一立场上,简单地概观中国近世社会的性质,同时,阐述与其他地域近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根据这种相互关系所规定的中国社会在世界史中的位置。

在第二章中,对宫崎氏的历史学方法,将以这种把握方式为基础介绍一下其核心的部分,并以此为起点,考察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确定为宋元史的基本问题以及其中还遗留着什么样的问题,由此提出作为考察结果而设想的宋元史的基本课题。

在第三章中,简单地说明本书所收录的论文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应宋元史的基本课题。

第四章略微详细地介绍了提出十分重要的问题的杉山氏对本书提出的宋元史这一概念的批评性看法,并由此简单地论述一下本书提出的宋元史这一概念的意义所在。

一、根据世界史的观点

(一)根据世界史的时代规定

这里首先要从将宋元时代看作世界史上的近世这一立场来概观宋元史,还要简要地指出其中的问题点,以备在以下章节中进行深入探讨。

按照宫崎市定的考证,将中国的宋元时代看作近世社会时,此时的中国近世社会被认为与西亚、南亚及欧洲的近世社会有着共通的时代特征。据我的一己之见,如果要简明扼要地概括世界史上的近世社会的特征的话,那么这是一种从农村时代转向城市时代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从宗教时代转向知识时代的文化状态的变化。

在农村时代转向城市时代这一社会结构变化的基础中,应该包含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建立在该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即使我们承认中国的近世社会、西亚、南亚、欧洲的近世社会这些不同地域的社会具有共通的发展阶段,而它们各自的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建立在该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处的社会性、历史性文脉却有着明显的差别。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决定中国近世社会个性的诸多因素及其作用。作为这些历史性文脉,应当首先指出的有这样一些问题,即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在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该社会的其他部分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受到什么样的社会支持或者社会制约?

作为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转化的中国近世社会形成的历史前提,应当关注的事态也是根据常识能够想到的,即此前的古代统一帝国的存在。这样,成为古代统一帝国形成和持续之基础的全社会性网络的存在,还有成为这种社会网络存在之基础的自然条件便成为问题。广袤平原和浩浩江河构成了广域性的交通条件,它的存在是自然条件中首当其冲的因素,而在中国农耕社会的中枢地区,浩浩江河沿着宏观上大致相同的气候带由西向东流淌,这也成为决定该社会统一模式的重要因素。这些自然和社会相互关联的存在状况,经过后来的中世纪社会之后,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改组。当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时,这些维持古代帝国统一的各种因素以及在中世纪时产生一定变异的各种因素,必然以它原有的形式或变异的形式而被继承下来。这里应当设想诸如官僚制集权统治、村落的多重性编制、组编国家性的流通机构、公共的以及像秘密结社和民众叛乱那种具有“反公共”意义的公共性质的军事力量等问题,这些因素至少构

成了作为中国古代国家的秦汉帝国成立以来,国家和社会贯彻始终的特征。可以说,这里的问题就是统一把握前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时代性的问题。

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转变的过程中诞生出来的世界史上的近世社会,对于其特征中的文化状况,如上所述,可以看到由宗教时代转向知识时代的变化过程。在先进的亚洲周边地区,在与先进的亚洲的密切关系中步入近世社会的欧洲,将近世社会的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可以说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变化,表现在宋元时期是儒教、道教、佛教的自我变革和趋向三教合一的变化。从综观上来看,这种变化与文艺复兴有着共通的性质,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将它看作与欧洲的宗教改革具有同一性质的话,便会产生抵触。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宋元时代的变化具有试图将个人置身于更广泛社会关系中的方向性,肩负这一方向的主体即时代的领军者们,从与传统统治阶层完全不同、拥有各自基础的社会阶层中脱颖而出,而且与这种新倾向相适应,他们的思维变得更为理性。换言之,他们追求和确立的是一种将超越自身生活圈的现象,通过现实的人际关系来加以重新构造的信念。

然而,事实上,这些典型的读书人或被称作士大夫的领军人物,不像过去那样形成世袭的统治阶层,他们期望把宗族中不同行业的个体家庭聚集起来,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他们在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最终基础,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一名官僚。不过是一芥草民的他们要想脱离生活的直接基础,成为远离地方、远离社会的中央政权的中坚力量,首先就要具备理性的、抽象的社会关系意识。正是这种理性意识,支撑了作为知识时代的中国近世社会。

但是,这里所谈到的理性不仅与欧洲近代的理性本质大相径庭,而且与最终孕育出欧洲近代理性的欧洲近世理性在本质上也完全不同。这种理性并不追求无限的抽象世界,而是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封闭的有机世界、最终由独裁君主制来统治的封闭世界中。

可以说,中国近世的士大夫曾经肩负过社会和国家的根基部分。不过这里有一个难题,即他们虽然通过了相当于国家考试的科举,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士

大夫,但这种科举考试并非他们自身创造,而是由皇帝所赋予的。

同样,皇帝的权力最终是否是由士大夫创造的,皇帝的权力是否拥有超越士大夫群体的权力基础呢?这是贯通整个中国历史都很难诠释的大问题。

本书稿没有余力深入探讨这样的大问题,鉴于问题的重要性,如果在此谈一点笔者不成熟的看法的话,我认为,皇帝的权力具有超越原本由士大夫所创造的社会结合体的、不同层面的性质。

首先,从权力的成立过程来看,成为宋朝权力之原型的,是从黄巢叛乱中分化而成立的朱温集团的权力,尤其是它的武力。关于这一点,笔者曾在《朱温集团的特点和后梁王朝的形成》(《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1992)中有过论证,因此,这里想简单地论述一下。朱温集团以茶贼、盐贼这类反社会群体作为成立的基础,这个反社会集团最终转变为后梁王朝的公共性集团。其中重要的是,在转化为公共权力之前的朱温集团,也是以反社会的身份存在,并与社会整体保持着联系的。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消极的公共性集团,而不是单纯的个人性质集团。的确,在该集团中也有一定的文臣官僚关系的萌芽,在促使该集团由消极的公共性集团向公共性集团转化时,这种萌芽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在此之前,该集团已经拥有了非个人性质集团意义上的公共性质。正是这种公共性质,构成了皇帝权力的最基本要素以及其超越性性质的根基。

至于说到作为科举原型的文臣集团,也许能够追溯到朱温的助手敬翔等人与朱温的关系,以及在黄巢集团的骨干人物中如张全义、韩建等这些独霸一方者与朱温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朱温既是集团的共同组织者,也是具有超越性的绝对的统治者。如果从实质意义上来探究该集团中文臣官僚制的萌芽的话,不管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已经是在一个以公共性存在的权力集团中,以军事需求为核心而成立的、由皇帝来实行的超越性统治的助手。科举最原始的形式或许可以在这里找到。

当然,这种关系并不能就此保障后梁王朝的成立。从张全义、韩建等人的

典型例子中可以看到,只有以民生为意,获得地方民众或作为民意代表的地方豪族的支持,通过这种关系的扩展延续才能得以保障。另外,从中还可以看到科举关系更深层次的、对地方实力者士大夫来说更为本质的出发点。

上述理论,设想了皇帝权力的核心中存在着公共性质的军事力量,并将其视为皇帝权力的超越性之基础。但是,该军事力量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成为肯定意义上的公共权力。可以设想,当社会其他部分接受这种公共性质时,它的地位开始得到确立,接受该性质的社会必然会将地方的士大夫当作所谓的天线,来触及军事政权。

但是,上述理论,是将中国近世国家权力的一切主要因素归结为朱温政权所创造的一种一方面锐利一方面不稳固的理论。现实中,中国近世的国家权力是融入了先行的一切相关要素而建立起来的。如西川正夫在《华北五代王朝的文臣官僚》(《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7,1962)等文章中阐明的那样,该军事集团的核心骨干武将们确立他们的地位以后一下子开始追求起文臣式的举止做派。这种现象是为了对应当时社会所赋予的、以往的国家关系传统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现存制度、风俗习惯、意识形态、人际关系等方面,采用一切形式来推动军事政权。这里还存在的问题,是在研究有关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转变时所涉及到的,即统一把握前近代中国社会的个性及其时代性的问题。

(二)在世界史的关系中

如果从中国史的立场来给宋元史定位的话,首先可以定义为从五代分裂时期开始,历经宋朝农耕地区的统一,直至元朝包括游牧狩猎地区在内的大统一的时期。这一时期,也就是宫崎市定认为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伊斯兰时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近世社会的形成时期。

另一方面,从世界史的观点来观察这些近世社会时,引起关注的问题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前面简单叙述过的,这些近世社会所具有的近世社会的共通点。另一个是从宏观上看,这些近世社会大致出现在同一时期的事实,以及以

支撑这一事实结构的商业、交通为基础的相互关联的实际状况。

这两个问题同时还包含了以下一些问题：这些近世社会各自与之前的中世社会和之后的近代社会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从纵观上看，这个时期，近世社会的相互关联使世界规模的商业和交通得以展开，这种以商业和交通为基础的相互关联，与之前的各文明社会和之后的各文明社会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位置？

如果以中国为对象，对后半部分提出的问题作一个简要回答的话，也许答案大致如下。

首先是关于中国近世社会的位置。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时代，正好处在世界史上的近世社会的展开时期。这个时期，是以魏晋南北朝的中世纪农村状况为基础，形成全国性城市要素或体制的确立时期。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在宋朝时期得到了确定，但是，这种基本上仅以农耕社会为基础的统一性社会关系，到了元朝时期，便朝着包括游牧、狩猎在内的大统一性社会关系方向发展。这种从统一走向大统一的循环，造成了某种形式的反复，即从农耕地区统一社会的明朝，走向包括游牧、狩猎社会形式在内的大统一社会的清朝。这种循环反复，在中国的农耕社会尤其是华中和华南地区，产生出更为成熟的社会前进步伐，同时还造就了帝国结构地区的扩大以及各结构部分之间更加紧密的相互关系。但是，对社会整体来说，其中作为近代世界形成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只停留在部分从属性上。这样一来，中国的近世社会虽然形成了以东亚为舞台的个人节奏，但最终没有独自形成现代社会，而是接受了欧洲工业文明的洗礼。

其次是这个时期世界性交流的定位问题。关于这一点，首先要注意的是以七世纪初叶东亚的隋唐王朝以及七世纪后半叶西亚的乌迈雅王朝成立为契机，东、西方交通重新活跃起来的问题。这一事态不久就成为在东亚的宋王朝及西亚的阿巴斯王朝时期确立的世界规模的交通、商业体系的起点。更进一步说，它甚至可说是不久到来的先是在亚洲范围展开、后又扩大到欧洲的世界规模的交通商业关系展开和确立的新的历史阶段的导火点。

这一时期的世界规模性商业的显著特点是,过去来自中国的丝绸织品、来自西方的香料等重点商品的交易进一步增加,海上贸易的比重加大,船舶的利用和大型化使大量商品的装载成为可能,在这些新条件下,作为中国出口主要产品的陶瓷器的比重也大大地提高。桑原隲藏在其名著《蒲寿庚的事迹》中有明确的论述,从唐末至宋代,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有了显著的发展,通过中国的大型船舶,将华中、华南各港口与印度大陆西南部、锡兰等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了通商圈。当时,锡兰岛以西的海上交通掌握在波斯和阿拉伯人手中,形成以印度大陆为中转站的全亚洲海上通商圈。正是陆地上诸多伊斯兰帝国的出现和那里十分活跃的商业、交通的发展,以及上面提到的通商圈的形成,构成了欧洲近世社会出现的背景。

如果将上述状况称之为亚洲时代的话,那么支撑这个亚洲时代的前提条件,就是亚洲人在海上和陆地两方面所进行的恒常的边远贸易,以及不同社会中广域而稳定的流通经济。随着蒙古帝国的出现,这个亚洲时代迎来了一个高峰时期。欧洲人开创的大航海时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造就出来的新动向,也是为亚洲时代和亚洲近世画上句号的世界史上的一个划时代时期。

作为欧洲时代先驱的大航海时代,如果它的开场具备上述背景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亚洲近世社会的稳定而广域的市场存在,对大航海时代的形成起到了肯定性的作用。如果将此设想再深入一步,即世界范围内近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欧洲近代社会诞生的重要基础之一。本章对这一大胆设想不展开讨论,但至少可以认为中国近世所拥有的广域而稳定的流通经济,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也是一个应当关注的问题。因此,我们断定在过去认为截然不同的近世和近代之间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这也并非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值得注意的是,宫崎市定曾经在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岩波书店,1962)的书评(《东洋史研究》22-1,1963)中,颇有同感地引用了吉川氏的论述“宋人们的生活环境,与过去中国的状况相比,具有划时代的变化,靠近了现代的我们”,这两位权威人士对宋代在感性上的一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不过,在强调